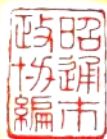


昭通文史資料選輯

第二輯



封面说明：

双鱼洗圆形图，系卅年代昭通出土的东汉双鱼洗临摹图。其文为：“建初八年朱提造作”（建初八年为公元83年）。此洗系昭通考古学家张希鲁先生访获珍藏。现藏昭通行署文化局。

横纹系汉砖花纹。

目 录

昭通方言疏证后记	姜亮夫 (1)
昭通一瞥	张希鲁遗著 (3)
近代史上西南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	曹吟葵 (6)
昭通李蓝起义梗概	刘华昭 (34)
戴德明烈士传略	费 炳 (41)
怀念 <u>孙厚甫</u> 同志	河北省出版 事业局顾问 杨 烈 (47)
为中华教育鞠躬尽瘁——邓子琴教授传略	
	西南师大 历史系 唐守荣 (53)
著名社会科学家姜亮夫教授	贺以明 (63)
昭通地区的交通历史概况	浦汉英 (80)
解放初期昭通的交通建设情况	邓 涟 (102)
昭通中学见闻补	伍谦之 (112)
吴梓伯遗墨小记	谢伙润 (119)
昭通妇女反封建斗争的一些回忆	张馨如 (124)
忆念老校长胡仲瑛女士	陆继英 蒋海明 (134)
昭通棋类发展情况	陈德祥 (140)
柯柬生卒年小考	谢崇崐 (146)
我所知道的昭通和平解放情况	李 湘 (149)
云南起义前后的回忆	杨 鹏 (157)

从北伐到抗战的回忆·····	李润民 (177)
昭通历史上的土司制和彝族习俗·····	陇承弼 (190)
昭通基督教简介·····	李鉴清 (207)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	第一届增补委员姓名录····· (219)

补白十三则:

- 大龙洞楹联 (2)
- 昭阳八景诗 (40、46、52、62、79、133、139、145)
- 嵩明古盟台考 (148)
- 凤池书院感旧 (156)
- 恩波楼楹联 (176)
- 五律诗二首 (218)

昭通方言疏证后记

姜亮夫

余家本金陵柳树湾人，明初以军功入滇，清初一世祖正荣公镇守昭通，遂为昭通人。不五世而孙仍云①近千，为邑盛族。昭通者，綰蜀滇黔三省之会，万商云集，于是五湖四海乔寓之客遂多，不三世皆去其旧籍而乡音未必都改。余少岁随诸父会族党五礼之仪，多闻异国方音。祖母终为辽东大姓，二伯母为外邑人，四叔母为玉溪人，姑父马为湖广人，外王父本道州何氏，外王母符为赣州人，而姑、姨、姊、妹之联姻外省者益不可胜计。民国十年（1921）就学蜀都，为《昭通方言考》时，往往遐思九族中人语。民国二十一年暂归乡间，得家君批语详核之，增益修正者多，使不大误。一九五四年余旅食六桥三茆间，心情动荡勃郁。七十以后，乡思日切，于是本枝百世之念，父祖九族之恩，与即外家诸父声音笑貌，时时浮现于神思恍惚颠倒纷絮之中。往往发其书索无声之诗，忆某言为某故某事闻于长老诸姑姊妹者，暂忘一时忧幽之疾，因为之疏证，以求本变丛生之流，于是此册遂成，余梦寐中与乡邦父老相亲之一术，以慰其衰朽“有家归不得”之思，如饮醇醪，以定其魂魄。余自出就外傅，浪迹江海，虽多思亲之情，时或匆匆一归，未尝不思远游之非计，而人世魍魎，亦既衰残，无人斗狠之乐，逃生无所，则当归依墓庐，守于父母之兆域，亦一幸也。今则八十有四，幸逢盛世，余得从容理其旧业，然手足局踖，范武子②之写穀梁，不敢翼望，而欧阳

公之瞽目天锡，遂思以役使文字，以为涓埃之报，然复时时惘然有徒以自欺而已之叹。吾女生一小女孙，名曰祖韵，为余时来解颐，郁困稍霁。而一旦静寂，复往事如烟，则亦茶苦如荠，遂复长思默坐，聊乐我颜。今者，乡邦执事诸公以盛情资助，《昭通方言疏正》幸亦得付剞劂。因赘此文，以致不忘云尔。一九八五年一月亮夫记于杭州秦望之麓

注①：“仍云”：《尔雅》：“昆孙之子为仍孙”。谓本身之下第七世也。“仍孙之子为云孙”。

注：②范武子，名甯，晋人。兴学校，养生徒，风化大行。迁临淮太守，封阳遂侯，补豫章太守，大设庠序，改革旧制，不拘成宪，远近至者千余人，以春秋穀梁未有善释，沉思积年，为之集解，其义精审，百世所重。（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713页）

大 龙 洞 联

生面别突开，看峭壁骨耸，怪石乳悬，问谁双手撑天，劈空此玲珑一洞；

尘氛都不染，俯孤屿泓清，寒潭泉洁，仗兹源头活水，流出去灌溉万家。

又 联

何处见蓬瀛，恐海上仙山，不饶斯清幽胜境；
此间来觞咏，听潭中泉水，别添出丝竹佳音。

昭通李崧甫 光绪庚子作

昭 通 一 瞥

张希鲁遗著

昭通有一件古董，能帮全省争无限的光荣，补无学术的缺憾，你们猜他是哪一样？我说就是孟孝琚碑。何以呢，我们要明白过去的云南，原来自战国时楚庄蹻来后，对于中原的文化，也要有相当的输入。然而经过两千余年到现在，结算下来，比贵州还不如，这真是可怪。在汉时有一个尹珍（牂柯人）去向许慎求学。毕业后回乡里教授，范曄称他“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”。又有什么盛览、张叔，还是有点可疑（因为览见《西京杂记》，此书是伪的。叔见《汉书·文翁传》，并没有说他是云南人）。自魏晋以来，虽然又出了些人，如李恢、吕凯等，也不过于政治上生了些问题，对于学术是全没有关系的。到了宋主惩唐亡之祸，于是“玉斧一挥，”遂将云南划出版图之外。既是如此，更无学术的可言。又到元朝改建行省后，才渐渐的有人。后来如杨一清的文章事功，钱沚的品节书画，几乎可与中原抗衡，但是就全国历史上比较，还是不在前列。你们看，清代闹得惊天动地的什么汉学，经过若干的时间，云南并没有正式加入一个。勉强说来，也只有一个王崧（云南省洱源人），据他的文集，他曾到昭通任教授，后以被谤弃职而归。桐城派的文章学，依曾国藩所叙述，也是流衍得十分广了，而云南依然落伍，岂不愧煞！，倒是贵州出个郑珍，居然做了经学大师。黎庶昌原来是他的弟子，后学文于曾国藩亦有可观。因此我看云南比贵州都不如。直到现在，林

纔为人作墓志，还用“云南即汉之西南夷”的话来讥消人。我们没有学术的铁证，也把他无可如何。但是严格的说来，云南真无一物可数么？罗振玉考证昭通孟孝琚碑道：“西汉石刻，世传至稀……此碑晚出，与庶孝禹石刻南北并峙，可谓海内有数瑰宝。……”由此看来，孟孝琚碑对于本省的好处就有两种：一种从书法文词上看，云南的文学，在汉时确是有渊源的；一种从碑的记载上看，昭通在千余年前，确出了一位少年学者，不但全省中所罕见，就全国也是有数的（要知在汉时能通一经者即为博士。孟孝琚通韩诗孝经外，兼能博览。若读班、范两史，即明孝琚在当代诚不可多得）。那么以蛮夷视云南的人，岂不变成“痴人说梦么”？林先生的眼光，正与中国昔日未知欧洲文明是一样，所以才说出蛮夷的话来。世间的事，无学术的人说好岂算好，说坏不为坏。罗振玉乃海内学术大家，好容易许可人一言。他遇着孟孝琚碑，由不得不秉公正直说。云南的文物，不惟压过邻省，直接可以说是南方的代表。可见此件古董，真是帮全省争光荣了。要说云南全无学术，人家也是不相信的，但是我们还要努力。

昭通自孟孝琚后，仿佛已不甚出人，惟是我们不能不有点怀疑。在唐朝中叶的时候，云南王阁罗凤陷嵩州，拿获一个相州人郑回来云南。回是很通经术的，王非常爱重他，就命他教自家的子弟。如果有不用心的，还可以用教鞭责罚。因此他教的成绩颇好，直教到王的曾孙寻孟凑。孟凑的父亲异牟寻曾拜他为相，他就献策将云南归服于唐，时韦皋做西川节度使，早欲招纳云南来分吐蕃的势力，所以将计就计的联络他。皋又欲把中原文化尽量输入，就遣派云南青年到成都去留学。史称留学的名额“殆以千数，”恐现在留欧美的也还不及，并且相继不断的都是五十年。依前说来，郑回在云南的学术影响，也就不小。况且又加大批的留学生，当然要有“人才彬彬辈出”的气象。昭通在前清时，照例也去了多少，岂此时反无一人么？就有不去的，难道又无一人来

向郑回求学？只是当日的人，但重记诵，不知著述，使后世少了一种考证的资料，是何等缺憾。现在可以作逆证的，幸有豆沙关一百二十二字的石刻。推究下来，可知唐使臣来云南时，昭通一带，已经是他们的孔道，出来当招待员的，未必全无程度。就遣派留学生时，昭通也一定占优胜。可是此辈留学生，在史上已不闻有一个能成名，也怕只能在乡里称土豪罢了，他就不知道今天平均他的总成绩。比较孟孝琬，不惟不及格，连他的姓名我们都不晓得，所以不能不有点怀疑。

昭通近代的学术，自然要推魏定一。在定一之前，明史虽载有“遣子弟入监读书”的话，然未闻有通籍成名的。其故在交通梗阻，书不易得，兼以土人椎鲁居多，读书一道，似非所宜。自清雍正改土归流后，各省人民迁居者渐多，不觉倒客为主，读书应考的人，方日甚一日，然卓然自树，能以文学自鸣的，也不多见。如定一除辞章之外，兼通经术，自是难能可贵。比之全国诸大师，当有愧色。至其清高拔俗，蝉蜕污秽，允为清代第一流人物，其所著《中庸衍义》及《诗文集》等，除少数人传诵外，海内得睹者尚稀。有志表彰乡先贤的人，于此不可不稍加注意。尝见石屏许印芳所辑《滇诗重光集》，选定一诗六、七十首，在全集中为最多，岂吾乡尚不及外人么？与定一齐名的，尚有柯柬。相传此人天份颇高，诗文并工，学使汪如洋见之，自谓不及。后以科场不利，乃狂傲不羁，滑稽玩世，颇与徐渭，金人瑞一流相近。至今乡里及邻县各处平民，辄好述其故事，以资笑谑。其行在四，故俗称之为柯四先生。若欲矜式后辈，提高人格，我们还是舍柯柬而取魏定一。

近代史上西南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

曹吟襄

李永和、蓝大顺农民起义，是中国近代史上西南各族人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。它开始于云南昭通地区，在滇东北、四川、陕南、湖北郧川为中心的鄂、豫、陕边区以及甘肃武都地区，坚持斗争了六年。全盛时期，起义军达六十余万人。在陕西先后曾与太平军陈德才、赖文光、梁成富等部并肩作战。关于这次起义的情况，解放前很少有人论述。四川一些地方志中，虽有一些记载，由于立场不同，多数是对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，对起义军丑化、诬蔑、攻击。解放后，在五十年代中期，国内有的史学工作者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，有过一些介绍。但由于某些政治因素，未能全面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。十年动乱以后，强加给史学界的禁锢，已一一冲破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平反了冤假错案，很多史学工作者，解放了思想，能够有机会实事求是地探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。所以，自从1979年《近代史研究》创刊号发表了史学家罗尔纲的《蓝大顺问题考》后，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讨论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章。但是，由于这一事件史料繁简不一，史实记录混乱。诸家研究，总不免各执见解，有些问题，至今仍不能得到统一。特别是起义初期在滇东北的活动，史料匮乏，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。

笔者是昭通人，对家乡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，有特殊的兴趣。解放后，计划把它整理出来，供地方人士参考。但查诸昭通印刷过的两部县志。仅有“咸丰七年，李短鞑鞑等相聚屯上，旋

乱四川。”这十几个字。因此，1956年，笔者开始对这一史料，进行一些搜集工作。曾访录过蓝大顺家族的墓志、族谱；访问过部份蓝家后代及地方中的老前辈；查阅过有关的几十部地方志。1979年，应昭通师专学报的约稿，曾选编过这一历史事件的部份地方志史料。现在利用一点业余时间，把这件事的经过写出来，作为地方史的参考，至于其中的讹误，可能会有，望对这一史料有兴趣的同志，给予指正。

一、李、蓝起义的时代

公元1840年（清道光二十年）鸦片战争后，帝国主义的入侵，使古老的中国，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由于清王朝的政治日趋腐败，封建官吏的贪婪残暴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，使农民破产，经济凋敝，阶级矛盾尖锐。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，它不仅是代表全国人民动摇清王朝统治的根本力量，而且促进和推动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爆发和发展。安徽北部的捻军起义；陕西、甘肃一带的回民起义；广东的陈开、李文茂领导的天地会、上海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；贵州张秀眉为首的苗民起义等，斗争矛头，无一不是指向清王朝的统治。与此同时云南各族人民反清的怒火也燃遍了全省。其影响较大的有：

1853年（咸丰三年）2月，哀牢山彝族农民杞采云兄弟在镇南县波罗村起义；

1855年，大姚彝族与金沙江沿岸的彝、回、汉各族人民武装起义，控制了金沙江沿岸，给清朝官兵以沉重的打击；

1856年4月，哀牢山区弥渡县爆发了李文学领导的以彝族农民为主体的大起义，聚结了彝、汉、苗、回、哈尼、傈僳、傣等各族农民五千余人，建立农民政权，提出了“铲尽满清赃官，杀绝汉家庄主”的反封建口号。之后，杞采顺的彝族农民武

装，也加入了这个政权，又联合了墨江田四浪领导的哈尼族起义军，争取了新平傣族首领刀成义所率领的队伍。从而组成了强大的各族农民起义部队。并配合杜文秀起义军并肩作战，斗争延续二十年之久；

1856年8月，杜文秀领导的回族起义军在大理建立了元帅府，很快得到白、汉、彝、纳西、景颇等各族人民的响应，声势浩大，影响遍及全省。接着会泽县回彝汉族农民数千人杀官攻城，昭通彝、苗族农民起而响应，吓得云南巡抚舒兴阿向清政府奏道：“势甚猖獗，行将波及川省。”这些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，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，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。

昭通（当时是恩安县治），是滇东北重镇，川滇交通要冲，商旅云集，回汉杂居。1856年（咸丰六年）十二月，昭通地方官吏为推行清朝政府民族压迫的政策，配合全省范围内掀起的屠杀回民的行动，挑动了昭通、鲁甸两县的回汉人民互相残杀，制造了严重的民族隔阂。在这期间“田野不辟，米粮罄尽，人民乏食。”据《昭通志稿》记载，当时“乡人逃入城，城中人逃入乡，流离奔走，骨肉不保。城门日闭，午时一开，庄稼未种，掘苕莠为食殆尽。后围卡有卖汤锅者，查系人肉，搜出头肢甚多，人众杀之煮以喂狗。白狗洞有诱儿煮食者，查明报官，甘就刑戮而已。府门口日坐妇女甚多，见有服色稍好者，辄尾其后而去，愿为妇为奴。”（注：苕莠为野生的芋类）。这种惨像，从咸丰六年持续到九年。使田野荒芜，商旅裹足，农民流离失所，城镇手工业者破产。这时，一些农民和手工业工人，为生活所迫，不得不远走他乡，另谋生计。李永和、蓝大顺等，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，离开家乡参加烟帮的。据唐炯《成山老人年谱》记载，李、蓝等是“皆避回乱，移家老鸦滩”的。

“烟帮”，是鸦片战争后产生的一种群众组织。当时，云南

种植的鸦片，四川商人多来贩运。一些有武艺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，组织起来受烟商雇用，为烟商保险护送鸦片，这就是“烟帮”。在护运途中，须与查缉官吏巧妙斗争，所以养成了机智勇敢，团结互助，疏财仗义的性格。

1857年，昭通府恩安县人李永和（俗称短鞑鞑），蓝大顺（名朝鼎）等，聚集在川滇道中大关县属天星场屯上，充当烟帮管带。往来于昭通叙府间。当时，正值昭通回汉“构衅”，庄稼未种。一些破产农民，家乡亲友，为生活所迫，都来投靠，人数越来越多。且李、蓝办事认真，讲究信用，崇尚侠义。在官家修的志书《湘军志》中也称他们“自托商贩，颇重身家，无反心。”所以，李、蓝是烟帮中的杰出领袖，“号为帮中巨擘。”

当时，四川的社会经济，在清政府看来“蜀尤完富”。所以“湘军兴，其饷最绌，恒仰资于越蜀”。四川成了清王朝供给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饷需的支柱。成都将军崇实也曾说过：“川省虽僻处西陲，实为今日根本要地。……其财赋之出，则足以灌输邻省源源不穷，军兴以来，贼势蔓延，金陵大股沿江出沒而终不得逞其志于两湖者，盖有全蜀故也。”这些财赋的来源，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。加之“官吏大小求取，辄压其望。”《湘军志》造成了四川社会“百物腾涌，民间重困，”农村破产，手工业工人大量失业，阶级矛盾尖锐。其苛捐虐政较大者，择述几项于后：

1、酷虐的差役：差役领票传案，本是职责内的事。但当时差役势焰，十分猖狂，罗织案中之人，巧取民间财物，勒索敲诈，达到极点，士农工商，无不受害。所以民间有“阎王易见，小鬼难饶”的谚语。差役领票入手，私带一帮未在籍的白役，到了原被告家，滥吃“下马饭”，强争估要“草鞋钱”。如果是人命案，除了向尸亲、犯属重索外，还要向地方邻居等派差派款。所谓“一家人命案，上七下八都遭殃。”倘若村子附近发现无主尸身，或者出了盗窃抢夺等案，整个村子都不得清静。验尸办案

的差役带领白役多人，进入各家搜索骚扰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最后只有多说好话，家家摊派钱粮送走。有时是口角细故，双方都不愿起诉，但差役闻讯，竟擅自唤押，进行诈索。这种酷虐的差役弊端，是人民最痛恨的虐政。连四川总督王庆云也愤慨地提出：

“川省差役捕盗传证、取赃，辄纠多人，持械搜掠，名曰‘扫通’者，此与强盗无异。请照强盗律，不分首从皆斩，兵丁有犯同之。”《清史稿·王庆云传》

2、押租剥削：咸丰三年，国子监司业崇福奏请预征山西省咸丰四年的钱粮。后来军机处大臣会议，把这项预征推广到四川、陕西两省。这种预征，名是向地主征收，但由于土地兼并集中，农民丧失了土地，沦为佃农。地主又把它转换成对农民的另一种剥削办法，于是产生了“押租”，也就是农民租地主的地种，要交押金。据《眉山县志》记载：“无田者居大半，率赁田而耕，名曰佃户。每亩质钱若干曰‘押租’。岁收所入十之六曰：‘租’。主家坐食，岁租有歉，则扣其押，或赎田他佃。”《合川县志》也说：“主人得其六，纳租以外，所余无几，又必先有保租（押金），始能写佃。一岁耕获，事事拮据。”押租剥削，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，造成农村破产，农民流离失所。加之灾荒频仍，饿殍载道，村闾为墟，加剧了阶级矛盾。

3、协济：咸丰元年，清政府确定四川为“协济省”。四川素称“天府之国。”“其财赋之出，则足以灌输邻省。”因此，清政府规定，四川每年要拨交东北固本饷银十二万两；甘肃，新疆协济饷银二百万两；贵州协济饷银五十万两；云南协济饷银三十万两。连当时的湖北也是依靠“蜀饷以自助”的省份。

4、改铸大钱，造成货币贬值。咸丰三年户部奏铸当十、当五十大钱。王大臣又请增铸当百当千，称为四项大钱。当千的大钱，以二两铜为率。咸丰四年，户部奏推广大钱办法。太常侍卿王茂荫曾上疏争辩说：“当百以上大钱，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

别，此何以贵，彼何以贱，难一；以易市物，则难分拆，以易制钱莫与兑换，难二；大钱虽准交官项，然准交五成者，已有宝钞官票，大钱何能并搭？难三。此尤其小者耳，最大之患，莫如私铸。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，即抵交官银一两，是病国也。盖行制钱，每千重百二十两，熔之可得六十两，以铸当十钱，可得三十千。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，民间将无制钱可用，是病民也。”这种推广大钱的办法，解决不了清政府的财政支绌，钱商私铸，货币贬值，人民生活进一步困苦。不数年间大钱已无人使用。咸丰九年工部侍郎袁希祖上书废除大钱，他说：“咸丰初改铸大钱，未几当百当五十皆不行，惟当十行之。始值制钱三五，近则以十当一。银值增贵，百物腾涌，民间重困。旗饷月三两，改折钱十五千，致无以自活。向日制钱重一钱二分，大钱重四钱八分，以之当十，赢五钱二分。今以十当一，是反以四钱八分之铜作一钱二分用也。民间私熔改铸，百弊丛生。……请悉复旧规，俾小民易于得食，盗源亦以稍弭。”这说明了推行大钱的危害性。

5、抽取厘金：厘金又称货厘、厘捐。开始是由湖北奏准，征收货厘，补充军饷。《昭通志稿》记载：“按《皇朝经世文统编》胡文忠公于咸丰六年因办江南军事，饷需百般支绌，始于关税正供而外，奏设厘捐以助军需。”什么是厘金？按当时的规定，每值银一两的货物，在正税之外抽取一厘，即千分之一的税率。但实际执行中，并不这样，往往根据货物贵贱，任意索取，值百抽二，值百抽三是普遍现象。至于特殊的“洋药厘金，”更假借军需为由，任意苛索。咸丰九年，四川叙州府在云南货物从盐津进入叙府境的筠连设厘金分卡，直属于叙府厘金总局。负责抽收云南货物的入境税。其中称为“洋药厘金”的鸦片入境税，任由关卡勒索，稍有待慢，卡官就提出没收或扣押人等相威胁。所以烟帮对卡官的苛求，十分愤恨，这是李永和、蓝大顺起义的导火线。

综上所述，①、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，促使云南各族人民反清怒火，燃遍全省；②、清政府挑起民族隔阂，使滇东北农业手工业破产；③、清朝官吏对四川人民繁重的诈取和酷虐的政治制度，激化了四川的阶级矛盾。这就是李永和、蓝大顺起义前云南四川的社会状况。所以仅有数百人的李、蓝义军进入四川后，各地响应，“闻声毡聚，旬月间众数万。”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，冲击着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。

二、李永和蓝大顺及其主要骨干

李、蓝农民起义，在四川的方志中，都冠以“滇匪”、“滇贼”等蔑称。义军进入陕西后，统治者的史料中又称“川寇”。《骆秉章奏稿卷二》曾说蓝大顺“初至绵州时，众至十六七万，伪都统皆昭通人，伪统领以下，始杂用川人。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领导这支起义大军的主要骨干是滇东北人氏。绝大多数官兵是四川人民。但是，这些主要骨干的家世，在地方志书中，记录甚少，谬误特多。因此，造成近年来有些研究内容，以讹传讹，莫衷一是。现将个人访录所得，补充部份，以备史家参考。首先摘引数则有关李永和、蓝大顺身世的记载于下：

1、蓝逆者，李短鞑鞑之一支，与短鞑鞑、唐大明、谢花么等同乡。而短鞑鞑云南人，……常于滇蜀交界昭通叙州两府之间，伙同蓝逆等持枪刀为往来滇川之烟贩保险，谓之烟帮。（四川邛崃县志）

2、蓝朝鼎俗称蓝大顺，李永和俗称李短鞑鞑，号为烟帮中巨擘。（名山县志）

3、蓝大顺李短鞑，居云南昭通大关边，以运护鸦片为私贩魁。其徒党无虑数十部，率三五人或数十人为一队，往来叙州、射利作奸。然自托商贩，颇重身家，无反心。（湘军志）

4、蓝大顺即蓝朝鼎，首逆李短鞑即李永和皆云南人，贩鸦

片烟者。（荣经县志）

5、蓝大顺滇中会匪，与李永和张五麻子为死党。（永川县志）

6、蓝大顺者，滇之东鄙人，矫健有武力。……大顺与弟二顺以贩运烟土充当带哨为事，往来叙永间久矣。（云阳县志）

7、李永和，云南昭通人，年二十三岁，因稍知书识字，众遂推尊之。（蜀甓述略）

8、蓝逆名朝鼎，云南昭通人，贼中称为帅主，骁悍善战。其族人名朝柱，年长朝鼎数月，呼之为兄，贼中称为副帅，然诸事悉听朝鼎调度。（骆文忠公奏稿）

从以上所引资料看，可统一几个认识：

①、李永和俗称李短靸靸，蓝朝鼎俗称蓝大顺；②、李永和蓝大顺都是云南昭通人；③、李、蓝当时的职业是持枪刀为往来滇川的烟贩保险的烟帮首领；④、李、蓝尚侠义，重信誉“自托商販，颇重身家，无反心”。是烟帮中了不起的人物，号为帮中巨擘，应该算做“良民”。

其次叙述一下，昭通民间对李永和、蓝大顺以及其他部份骨干将领的传说：

1、李永和，昭通民间一直称为李短靸靸，《邛崃县志》中说：“因其军以割辫为记，故号短靸。”认为李短靸靸一名是起义后喊出名的，其实不然。据民间传说，他是昭通县洒渔河柳树弯人，从小就不愿梳辫子，只留点短靸靸。“靸靸”是民间土话，意思是短发辫。李永和的头发剪成短靸靸，这是下层社会劳动者为方便劳动采取的一种发式，并不如某些史学工作者想像的那样，认为是一种反清的行动，（因为清代的男人多是剃前额梳辫子）。李永和原在昭通县铁匠街张姓家打铁，很有膂力，初识文字。在每天晚上休息时，还唱书给群众听。解放前，昭通戴敬明先生讲：“据说，李短靸靸唱风波亭，唱到武穆父子被害，男妇老幼无不感叹歔歔！”家中无老幼，只有一个远房的堂兄李永成。为人好打“抱不平”，对铁匠手艺也很在行。农民进城买锄头，